



民族书写下的价值共鸣与情感联结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的文学世界

□阿尔曼·艾林(哈萨克族)

叶尔克西的创作表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必须植根于各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生存空间和价值追求。她以冷静而宽容的叙述,保持对于民族历史与现实课题的耐心,也清醒回应其中的抵牾与错位。同时,将书写的重心落于人物真实鲜活的行动之上,而非简单诉诸对宏大命题的直接阐释。正是在这种克制的笔墨中,她的作品蕴含了对民族未来愿景的深切寄寓

作为两次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哈萨克族作家,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在刻画民族传统风俗习惯的同时,对文学疆界进行诗意图,在书中管窥多元文化对话与交融的共同体经验。其作品既观照真实的民族生活世界,又回应了新时代的价值追问。

传统与现代的和合共生

叶尔克西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自己“来自中国新疆,出生在亚洲大陆的腹地。一个出生在这个地方的孩子,能感知来自四大洋的季风从耳边吹过,更能感知到一股小风吹过脚下一丛骆驼刺发出的风鸣,能听到一只母羊呼唤它的孩子时发出的声音”。叶尔克西的创作实践,本质上是一种对传统的现代性转译,她并非简单地复述传统的故事框架,而是从现代主体的理性视野出发,洞察哈萨克族传统知识体系,试图找到传统与现代性的平衡点,使其在新时代的语境中焕发出新的美学张力。

在散文集《草原火母》中,北塔山牧场成为作家展现民族生命哲学的特定背景。叶尔克西往往从微观具体的细节处着眼,借镜具体的自然物象,通过对牧场上文化仪式的书写,展现民族主体性与能动性。民族化的表达使哈萨克族的生活状态得以血肉丰满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游牧文化词汇的运用,将哈萨克族人对自然的敬畏、部落的伦理以及待客的热忱编码于文本中,从而具象化了游牧文化的独特性。例如,哈萨克族把银河称作“天鸟路”,因为在转场路上,银河的流向总顺着牧人的迁徙路线,与天鹅南迁北往的轨迹重合。我们会发现,传统并非抽象的概念,而是在细节中渐次出现,显示出民众朴素的认知与生存智慧。叶尔克西对传统的书写具有本真的质地,对民族文化主动性择取构成了其散文独有的诗意。

对于民族传统,叶尔克西选择节制地展现,并通过评价的方式来表现其现代心理:“我们是大自然的后代,是大自然缔造了我们的母亲,不仅给了我们生命,还塑造了我们的形体……在‘月之母’之前,世界没有神,只有大自然本身。”叶尔克西从传统的先民神话思维中解脱出来,以一种现代性眼光剖析哈萨克先民的创世传说,将人类的“神性”还给大自然本身,同时惊叹于祖先的思辨意识:“它是客观的,也是理性的;是朴素的,也是诗意的。”

叶尔克西的创作中,时时可见传统与现代的对话。在谈及创世传说时,她说,“打动我的与其

说是一种美的感动,不如说是一种理性光辉更为准确”。传统与现代形成交集,理性的形象跃然纸上,她对哈萨克族历史的探索体现出某种现代性过滤,通过跨文化的视角带来对传统的全新解读,思辨与叩问的底色贯穿始终,直指对生命本真的终极追问。因为“我们好像越来越想不明白自己是从哪里来的?我们要干什么?要到哪里去”,于是“先锋、颠覆、不确定——这样的词来安抚我们躁动的灵魂”。已有的传统在追问中融进新的思考,与读者产生了超越既有维度的价值共鸣。

激活文化符号的丰富意蕴

值得注意的是,叶尔克西的民族书写并未落入标签化的窠臼。她以纯粹和充满感情的创作姿态,完成了从“外在回应”到“内在共鸣”的审美超越。

在《永生羊》中,叶尔克西让文化元素深入牧民的日常生活,使之在自然流淌和聚集中指向某种深刻反思。“夏牧场在大山中,平地在平川上。一户人家上了夏牧场的山,总有下山的那一天,而一户人家下了山,也总有再上山的那一天”,这就是“牧人的路”。牧人在特定空间的循环活动中逐渐走出生命的痕迹,而与这人生的周行与回归如此相似。她用一环扣一环的叙事让我们体察到,牧人与共生共息的动物之间早已扬弃了功利性的关系,建立起流动的可能性。“永生羊”作为生命永续信念的载体,既出现在羊群中,也存在于牧人对自然的敬畏之中,文化成为在牧民具体可感的生活中流动和生长的生命体。“一户搬迁的人家出现在那个山梁上。先出现的是一个骑在白马背上的男人,接着是一峰骆驼、又一峰骆驼,又是一峰骆驼,一两头牛,两个骑马人。他们(它们)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在高坡上,像一串串在一起的珠子……”这段对于转场场景的描写,并未将毡房作为游牧文化的标签进行定格,而是将其放置到牧人的有机生活之中。骆驼所驮载的毡房部件与其说是物质生活的必需品,毋宁说是代表了精神家园。“我家的第一顶毡房正是由几位牧人‘各家出部件,合伙搭起来’的,后来这顶毡房被送给表哥作为婚房,毡房的天窗则被看作‘家园的象征’。哈萨克族不说‘继承香火’,而说‘继承天窗烟火’,其背后指向的是互助精神的传承。毡房作为家园的具象化,不是孤立存在的个体,而是在共享和互助中构建起来的情感共同体。

牧人之间的互助、人与动物的共生、族群文



化的代际传承,这些都是共同体理念的生动注脚。这种从民族文化到普遍价值的转化与升华,是在跨文化传播的语境下实现的,叶尔克西的双重作家身份为之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与可能性。她兼具哈萨克族母语文化底蕴与汉语书写能力,在精准捕捉承载集体记忆的文化符号的同时,可以跳出族群的认知局限,洞察这些符号背后的普遍价值。

共同体意识中的情感联结

如果说新疆是叶尔克西文学世界的地理基底,民族文化书写是其精神内核,那么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学建构,则是其创作对时代呼应的深切回应。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基,扎根在各民族共通的日常伦理与情感互动等柔力量中。《白水台》以白水台新村及周边的四季牧场为地理坐标,用洗练的深描笔法铺陈共同体意识生长完整的完整轨迹,同时将微观的生存景观具象化为互相协作的转场情节。邻里之间一碗热气腾腾的奶茶,不同民族为一个新生儿共同赋予名字的瞬间……这些场景构成了共同体意识最鲜活的外在表现。

转场这一行为,以场景化的叙事在小说中反复出现。“转场时,按乡政府办的统一安排,会一个村一个村转场,每家十几峰骆驼,三四百只羊……浩浩荡荡,那才叫世纪大迁徙,蔚为壮观的。”有序的转场过程在推动叙事的同时体现出牧民对草原的敬畏,政府的参与则让传统行为与现代治理衔接,体现出各族人民的团结互助。各民族的情感联结在命名这一文化仪式中可窥得一二,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注脚。“白水台人家有请贵人给娃起名的习俗”,小说中的两个人物尤莱·叶森与威成·叶森就由罗军医起名。“罗军医就不再推脱,想了想,给尤莱起名叫雨来……雨后的白水台空气清新,雨水是吉祥的象征,古人说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两年后,威成·叶森出生时,罗军医说那天是“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的日子……无数颗星星正挣破夜幕,宛如璀璨的钻石”,罗军医“突发奇想,说:‘噢!咱们索性给你家刚生的儿子起名叫卫星吧,纪念一下这个日子’”。这两个名字将个体生命与国家记忆以及自然馈赠紧密连接,体现出情感的共鸣。

然而,作者也敏锐地意识到共同体意识的建构并非平稳、线性的进程,而是在时代转型的具体情境中不断对话和博弈,她并未在小说中回避

这种曲折性。“尤莱·叶森虽说已经定居新白水台村了,因为过去一直以牧羊为主业,还是要跟牛羊打交道。”物质层面,尤莱一家已经住进“水电暖都有,还有网线”的新村住房,基本告别了以水草资源为导向的流动性生产生活,但在精神层面,他仍旧坚持参与转场、亲自照料牛羊,对传统游牧生产方式有着精神依赖。同时,他也清楚,尽管“跟牛羊打交道,是他们叶森家家传的行当”,但是“至于他们的下一代,是不是还会跟牛羊打交道,就不好说了”,因为“时代在发生变化”。小说发出喟叹:“白水台牧民定居是定居了,但脑袋里的白水台要定居下来,还得有一阵子。”“定居”同时指向了亟待被接受的新身份认同。

叶尔克西的创作表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必须植根于各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生存空间和价值追求。她以冷静而宽容的叙述,保持对于民族历史与现实课题的耐心,也清醒回应其中的抵牾与错位。同时,将书写的重心落于人物真实鲜活的行动之上,而非简单诉诸对宏大命题的直接阐释。正是在这种克制的笔墨中,她的作品蕴含了对民族未来愿景的深切寄寓。

(作者系暨南大学博士研究生)

华南抗战史诗的生动呈现

——评钟二毛长篇小说《东江纵队》

202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瑶族作家钟二毛的长篇小说《东江纵队》出版。这部入选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的作品,将一支不为大众所熟知的英雄部队——东江纵队,重新拉回公众视野。钟二毛用20年的采访积累与文学匠心,完成了一次重要的历史普及与精神传承。

《东江纵队》以司令员曾生为叙事视角,串联起一部全景式、有温度、有细节的抗战史诗。小说最动人的对“书生扛枪”初创历程的细腻描摹:一群怀抱救国信念的知识分子,放下书本、拿起武器,在孤悬敌后的华南大地建立抗日根据地。小说没有回避初创期的艰难,生动展现了东江纵队“白皮红心”的生存智慧,即面临日军清剿、国民党顽固派排挤、地方势力观望的三重困境,为避免过早暴露身份招致毁灭性打击,部队并未公开亮出共产党领导的旗帜,而是以抗日武装的面目活动。这种机动灵活的斗争策略,让历史人物摆脱了扁平化的英雄叙事,多了几分真实可感的智慧与坚韧。

书中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文学重构,更让尘封的史实变得鲜活可触。浓墨重彩的“文化名人大营救”段落,再现了1941年日军占领香港后,东江纵队历时11个月、行程两万余里,安全转移何香凝、茅盾、邹韬奋等800余名文化精英与爱国人士的壮举。小说通过游击队与文化人士的互动细节,还原了这场被茅盾誉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的惊险与温情。战士们化装成渔民护送学者穿越封锁线,村民用粗茶淡饭招待颠沛流离的文人,这些场景让读者真切感受到“枪杆子保护笔杆子”的肝胆相照。而营救美国飞行员、与盟军情报合作等情节,则拓宽了作品的国际视野,展现了华南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位置。

《东江纵队》的突破性贡献还在于挖掘了被忽略的历史细节。第六章“国际合作与胜利”中,作者聚焦东江纵队追踪日军“波雷部队”的史实。1944年,擅长洞穴作战的波雷部队神秘失踪,美军久寻无果。东江纵队情报人员通过实地勘测与卧底侦察,不仅发现该部队隐藏于汕头沿海工事,更将其

防御部署绘制图转交美军。这一情报直接促使美军放弃华南登陆计划,成为其决定投掷原子弹、加速“二战”结束的重要参考。这一历史学家极少提及的历史关联,被钟二毛以文学笔法加以呈现,为抗战史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细节处的考据功夫,更彰显了作者对历史的敬畏之心。举一个小例子:“日本鬼子”本是抗战题材文艺作品的通用表述,但在《东江纵队》里出现的却是“日本仔”。这是广东、香港民众对日寇的真实称呼,看似微不足道的用词考究,背后是作者对史料的严谨态度、扎实的史料支撑、经得起推敲的细节,让这部作品的历史叙事有了坚实根基。

回望那段波澜壮阔的抗战历史,《东江纵队》的出版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它以生动细腻的文字描摹历史,让年轻读者得以真切触摸那段被遗忘的过去,让抗战精神在新时代依然能薪火相传。

(作者系中国评协会员)

也许这里就是远方

——读李云华诗集《风铃谷》

□丘文桥

是具体的、可触摸的,又是抽象的、象征性的;既是地理意义上的故乡,又是精神意义上的家园。

诗集的第二辑“向一座城走去”集中书写了诗人的城市,邕城南宁就是诗人的“远方”,诗人在城市中寻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城市对李云华而言,不仅是生活的空间,更是身份认同的场域。在《与一座城对饮》中,他写道:“有人爱一座城/有不同的理由/但我在邕城的城墙上/看见自己的影子/与城墙的轮廓一模一样”。这几行诗巧妙地揭示了诗人与城市的复杂关系。他不仅在观察城市,也在城市中观照自己。城市不仅是他者,也是自我的延伸。

“有人叫卖起回忆/有人拼凑着残梦/有人默不作声/静静等着夜幕降临”。在《邕城记忆》里,李云华写道:“1995年一朵白云降落邕江/没有泛起涟漪”“2023年有人微醺/在邕城的某个角落/写下了邕城记忆”。将近30年的城市生活带来的思考,在诗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达。同类题材的《邕江之水》《晚睡的邕城》等诗作同样如此,诗人没有回避城市生活中的疏离感与困惑,而是以诗的方式与之对话,试图在喧嚣与浮躁中找到内心的安定。他在城市中回望大山,也在大山的记忆中审视城市,这种双重视角使他的城市诗歌具有了独特张力。更为深刻的是,诗人在城市中保持着对精神家园的追寻。他在《向一座城走去》中勇敢地写下:“我是不是以一瓢水/告白所有无助的目光/顺流而下/前方有没有我前世遗忘的家乡”。这种追寻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返乡,更是精神意义上的回归。城市对诗人而言,既是现实生活中的场所,也是精神探索的起点;既有困惑与迷茫,同时也激发感悟与创造。

相对于山和城市,海在《风铃谷》中代表着诗人向往的另一种存在维度。它不仅标记着诗人的游历行踪,也象征着精神探索的延伸。面对海的辽阔,诗人的体悟被击穿、被打开、被提升。“这是必经之路/也是必经之心”,如《这是一条通往大海的道路》《靠近海》等诗作中所写,在诗人的认知里,海不仅是物理空间的跨越,更是心灵境界的拓展。

李云华对海的书写充满哲思色彩,“有时候靠近/并不是要拥有/有时候远离/并不是失去”;带着《一只搁浅的小船》的诗人写下“也许还有远方/也许这里就是远方”。这种辩证的思考展现了诗人对存在本质的深刻洞察。海风吹过,带来许多不可言说的表达;浪潮的海、通往海的道路、搁浅的船,无不成为诗人的内省的契机。“跟随自己的影子”,反复阅读自己的内心,这种自省姿态使诗人的咏叹超越了简单的抒情短句,实现了对生命的深入思考。

从人世间走过,诗集中那些关于亲人的忧思、关于中年困惑的诗篇,极具感染力地呈现出生命中的疼痛与温暖。诗人对于人世间往往返的人与事有了更成熟的理解,这些理解既有对生命疼痛感的直面,也有呐喊式的抗争。面对人到中年的困惑,诗人没有逃避,而是以诗的方式与之周旋。这种周旋不是消极的接受,而是积极的对话。李云华在中年的门槛上回望青春,感受生命的局限,也探索突破的可能,诗人找到了表达情感的最佳平衡点,这些诗篇感染人肺腑而余味悠长。

“漫天的风铃花,不知哪一朵才是你的前世”,阅读完整本诗集,我们或许会发现,这个问题本身比答案更为重要。《风铃谷》不是提供现成答案的诗集,而是激发读者思考的诗集。诗集中的每一首诗,都像是漫天花雨中的一朵,它们共同构成一次心灵的旅程。

李云华对山、海、城市、人世间的深刻体悟,对传统与现代的双重凝视,对语言艺术的精湛把握,使整部诗集具备了较高的思想深度。而那“缺席”的风铃花,让《风铃谷》不再是一个封闭的空间,而成为每位读者都可以进入的精神领地,这恰恰成为最有力量的象征——它们不在诗句中,却在读者心间;不在诗面上,却在精神里。漫天的风铃花,哪一朵才是你的前世?或许,当我们合上诗集,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时,这个问题才真正开始它的旅程。

(作者系广西评协副主席)

壮族诗人李云华的诗集《风铃谷》,书名与花朵有关,与一个充满诗意图象的空间有关。这个书名自带画面感与音乐性,让人眼前即刻浮现一个风光优美、悬挂着无数风铃花的山谷,微风拂过,花影摇曳。风铃花的花语是感恩、温柔的爱,代表着对他人的关怀与帮助的感谢。然而,在180首诗歌中寻找具象的风铃花,却几乎一无所获,这种命名的“缺席”与抒情的“在场”构成了阅读谜题,也恰恰成为理解这本诗集的密钥。“漫天的风铃花,不知哪一朵才是你的前世”,或许正是读者进入《风铃谷》的恰当路径:不是去寻找具体的花朵,而是通过诗人对山、对海、对自身生活的城市、对人世间的深刻体悟等,去寻找那隐藏在抒情背后的丰富哲思。

《风铃谷》收录了李云华近年来创作的诗歌,分为“开门见山”“向一座城走去”“海风吹过的夏天”“从人世间走过”“当我们仰望星空”五辑。诗集以《风铃谷》命名,却没有直接描写风铃花,这种表面上的矛盾实则揭示了诗歌创作的本质特征,即象征与隐喻的力量。风铃花并非实体性的存在,而是作为一种精神象征贯穿始终。它代表着诗人对世界的根本态度:感恩与爱。这种感恩不是简单的致谢,而是对生命的深刻体认;这种爱不是浮泛的情感,而是经过生活历练后的柔情回望。

李云华的诗歌有着深厚的桂西北乡土根基。诗人凭借丰富的意象深度刻画了那片土地的生存本相,以及自己与故乡的复杂情感联系。地处大山的家乡既是诗人想要逃离的所在,又是无法割舍的精神脐带。他在《开门见山》中写道:“是我想逃也逃不掉/也是不知怎么逃的成长的一部分”。这种矛盾心理道出了许多从乡村走向城市的写作者的共同体验。大山给予诗人的不仅是成长的记忆,更是诗情的源泉。我们看到诗人如何将乡土的滋养转化为诗歌的养分:“就有可能把家乡喂养/成为诗和远方的田野”。这种转化不是简单的遥望或怀旧,而是对乡土经验的艺术提炼与精神升华。诗人笔下的乡土既